

明代文学思想研究

左东岭 著

花香入夜清
月出每孤注
露不辞芒履
流欲写猗兰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明代文学思想研究

左东岭 著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文学思想研究/左东岭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ISBN 978 - 7 - 100 - 08720 - 9

I. ①明… II. ①左… III. ①文学思想史—研究—
中国—明代 IV. ①I20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2345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明代文学思想研究

左东岭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8720 - 9

2013年12月第1版 开本 640×960 1/16

201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5 1/2

定价:106.00元

目 录

朝代转折之际文学思想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1
玉山雅会与元明之际文人生命方式及诗学意义	10
元明之际的种族观念与文人心态及相关的文学问题	28
陶安与元明之际的社会思潮与诗学思想	60
平江文人群体与玉山草堂文人群体关系研究	73
高启之死与元明之际文学思潮的转折	91
论宋濂的诗学观念	114
论刘基诗学思想的演变	129
元明之际的气论与方孝孺的文学思想	156
闽中诗派与主流诗坛关系研究	180
论林鸿的诗学观念与诗歌创作	
——兼论文学史研究中对前人学术评价的态度	205
论台阁体与仁、宣士风之关系	226
良知说与王阳明的诗学观念	241
阳明心学与唐顺之的学术思想、文学思想及人格心态	256
从本色论到童心说	
——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流变	302
论李贽的文学思想	317
从良知到性灵	
——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演变	393

从愤世到自适	
——李贽与公安派人生观、文学观的比较研究	411
阳明心学与汤显祖的言情说	427
阳明心学与冯梦龙的情教说	445
心学与明代文学	463
中国文学思想史的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	
——罗宗强先生学术思想述论	501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中心与边界	520
历史研究中的文献阐释与文人心态研究	534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转型期的技术化倾向及其缺失	551
后 记	560

朝代转折之际文学思想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韦勒克在其《文学理论》中，曾把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这样两个层面。尽管他没有完全否定外部研究的价值，但认为真正的文学研究应该是文学内部研究，所以他在其八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中，基本没有按照政治史、经济史或文化史的段落做划分，而是将其分为文艺复兴、巴洛克、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等几个大的文学思潮来描述近代欧美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可以说，以文学作品为核心，以审美性为目的，以文学理论范畴为基本范式，是韦勒克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的基本思路。

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与文学理论史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朝代来划分的，从而分成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辽金元、明代、清代与近代等。这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中国的文学发展与政治关系极为密切，每个王朝的文化政策、每次大的朝政变动，都会引动文人们敏感的心理与情感，并对其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许多时候朝代的更替也是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的分期标志，如魏晋时期就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从先秦两汉的以政教论诗到六朝唯美主义的分界线，因而被称为文学自觉的时代。但是，以韦勒克的眼光看，这种划分方式依然属于文学的外部研究，因为最终的依据还是政治史的。文学的发展有时与政治是同步的，而有时则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文学

创作的风格、流派与观念大多情况下不会因为朝代的变迁而泾渭分明地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如果人为地将其割裂开来，显然不利于文学研究。可是长期以来，大多数学者却都是以政治史的分期作为分段标志而展开自己的研究的。根据笔者的涉猎范围，也许朱维之先生是个例外，他在其《中国文艺思潮史稿》中^①仿照西方思潮史的写法，主要线索是依照文学思潮的演变来叙述的，历史则成了一个时间的参照物。比如他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来叙述元明清三代的文艺思潮，而所有这些思潮都是跨越政治分期的，从而显得很有学术个性。当然也还有许多未尽如人意之处，主要不足起码有两点：一是线条太粗，漏掉了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二是所使用的理论范畴术语基本上是照搬西方的，从而与中国的文学发展过程不能完全符合。但朱先生的这种探索笔者认为还是极有学术价值的。

朱先生著作的价值并不是由于符合了韦勒克的文学研究范式，而是因为他解决了跨时代文学现象的研究与叙述。抛开韦勒克的理论不谈，用政治史的标准来研究文学发展，起码他对研究朝代转折时期的文学现象是极为不利的。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朝代更替时期往往是政治、经济、哲学、文化，甚至是风俗习惯的大变动时期，而各种历史因素的变化必然带来整个历史环境的变化，作为反映历史变化最直接、最形象、也最全面的文学，理所当然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朝代更替时期的文学，也许不一定是创作上的高峰期，但却肯定是文学思想、创作心态、审美趣味、文学风格等重要文学因素的大变化时期，从而显示了其变异性、过渡性与转折性等重要特征。而且，朝代更替时期的文学变

^① 参见朱维之：《中国文艺思潮史稿》，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迁往往牵涉面非常深广，其变化常常是前一朝代各种历史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同时又会对下一朝代的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因而研究朝代更替与文学变迁的关系，可以更好地梳理各种文学现象发展演变的基本线索，对文学的演变过程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有利于对中国文学史做整体上的把握，同时还可以通过对各朝代更替时期文学演变的相同与不同的诸复杂因素的研究，从而发现一些带有深层规律性的东西，以便对中国文学的历史做出更深入的探讨。这种研究不仅对历史真相的还原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现代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但是由于采用政治史的分期方式，所以往往是以一个朝代或者几个朝代为基本单元，为了照顾单元的完整性，也就不得不在许多情况下以牺牲朝代与朝代之间文学发展的连贯性作为代价，从而在客观上造成了朝代更替时期研究上的缺陷与空白。因此，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现代学术史上形成一个学科以来，还没有人将朝代更替与文学变迁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加以研究，因而也就不能在古代文学的研究中留下许多疑问与难题。比如，就文学分期而言，建安文学的归属问题，是将其归入汉代文学还是将其归入魏晋文学，至今仍是个争议很大的学术问题；就作品归属而言，对《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不少文学史与小说史将其作为明代文学的重头作品，可是几乎产生于同一时间与具有相同的创作倾向的《琵琶记》则被划入了元代，然而也有人将前两部小说作品（如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划入了元代文学之中，其归属的混乱于此可见一斑；就作家而言，钱谦益本是公安派成员袁中道的好友，他的许多文学活动都是在明代后期，但目前的文学史教材却为了朝代的划分将其置于清代初期，其做法无疑是主观武断的。像上述的这些争议与混乱可以说大量地存在

于古代文学的研究中，也就不能不影响到对朝代更替时期的文学现象的研究，更谈不上对朝代更替与文学变迁之间深层关系的研究了。尤其是对于文学思想的研究，就更需要将朝代转折时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观照。文学思想研究包括了创作风格、文学流派、理论批评、观念演变的丰富内涵，以文学思潮的演变为主要线索。它更强调立体感与连贯性，所以也就更关注文学自身的发展变化。换句话说，它是将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结合起来进行操作的，既要弄清文学思想本身的理论内涵与来龙去脉，也要探讨其形成的种种复杂因素。

具体到元明之际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研究而言，自当有其独立的学术价值与意义。首先是保证了其研究对象的完整性。元明易代之际的文人往往由于政治归属的原因而被划入不同的政治势力，又由于不同政治势力兴衰而被分属于不同的朝代。其实从文学思想研究的角度看，这是很没有道理的。比如宋濂与戴良二人，同属浙东文人，同出柳贯、黄潛之门，但清代学者在将二人的别集收入“四库全书”时，却将戴良归入元代，而宋濂则归入了明代。其实二人不仅年龄相仿，而且仅就卒年而论，戴良卒于洪武十六年而宋濂却卒于洪武十三年。之所以将较宋濂还多在明代生活了三年的戴良归入元代，主要的理由就是因为他“迄未食明禄也”^①。宋濂则早在元至正十九年即被朱元璋所聘请而投入朱明政权，因其为“开国文臣之首”而被归入明代。这种归属对后世影响极大，今人杨镰《元诗史》仍将戴良归入“赴难诗人”之列，而宋濂则成了明代文学的开山人物，多数文学史著作都将宋濂被朱元璋征召笼统地说成“明初”，甚至专业历史工具书《中国历史大辞典·明

^①（清）永瑢等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68，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58页。

史卷》也说他“明初应朱元璋召至应天”^①，其实宋濂受征召的时间距明朝之建立还有整整九年，将其说成“明初”显然是一个叙述上的失误。如果就文学思想研究本体看，这种划分是非常不利的。宋、戴二人同属浙东金华文人集团，同出一个师门，都强调文学的政教与实用功能，很能代表该地域文人文学思想的共同特征。同类的情况还有杨维桢与陶安，前者卒于洪武三年却常被视为元代诗人，而后者卒于洪武元年却被列入明诗人群体，其原因也是以其是否归顺朱元璋政权作为分辨标准。如果将元明之际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这样的割裂之弊将会被避免，从而更完整地观照该时期的文学思想。

其次是对当时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过程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比如台阁体是明代前期流行的文体，今人的文学史著作大多以“歌功颂德，形式工稳”来概括它，而且在叙述立场上大都持贬抑态度，其实对此作出较为准确概括的还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该书在序杨荣文集时说：“发为文章，具有富贵福泽之气。应制诸作，泐泐雅音。其他诗文，亦皆雍容平易，肖其为人。虽无深湛幽渺之思，纵横驰骤之才，足以震耀一世。而透迤有度，醇实无疵。”^②其核心在于实与醇、合于道的宗旨与实用的目的，当然还要加上“透迤有度”的温柔敦厚体貌，这是明代前期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思想，也就是所谓的“台阁气象”。但台阁体并非始于明代，如果仅就明代自身着眼，便很难对台阁体有一个完整认识。台阁论诗文起码在唐代就已经出现，但是把台阁与山林作为相对应的两个体派却是始于元代。元代文人尽管在政治仕途上机会不

① 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9页。

② （清）永瑢等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70，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84页。

多，而且即使进入朝廷也很难占据重要的决策位置，但是他们在文化上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凡属制作礼乐、纂修史书、诏诰奏议、碑铭传记等事，均须靠他们承担，因而馆阁就成为他们施展才能的地方，同时也成为许多文人向往羡慕的地方，而台阁之文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文人所尊崇的理想体貌。对此戴良曾做过集中的概括：“自天历以来，擅名于海内，惟蜀郡虞公、豫章揭公及金华柳公、黄公而已。盖四公之在当时，皆涵淳茹和，以鸣太平之盛治。其摘辞则拟诸汉唐，说理则本诸宋氏，而学问则优柔于周之未衰，学者咸宗尚之，并称之为曰虞揭柳黄，而本朝之盛极矣。”^①从作者角度讲，虞集、揭傒斯、柳贯与黄潛的确能够代表元代的台阁文章；“涵淳茹和”则是雅正冲和的体貌要求，“说理则本诸宋氏”乃是体现的文章之宗旨。至于“摘辞则拟诸汉唐”则是文辞上的要求，其具体内涵可用黄潛的话作为补充：“予闻昔人论文，有朝廷台阁、山林草野之分，所处不同，则所施亦异。夫二者岂有优劣哉？今四方学者第见尊官显人摘章绩句，婉美丰缛，遂悉意慕效之，故形于言者类多有其文而无其实。”^②尽管黄潛在此是批评只讲外在的“摘章绩句，婉美丰缛”而不顾文章之实，但他却不经意间透露了台阁体华美婉丽的文辞特征。总结起来讲，元代的台阁体的特点是体貌平和，崇尚实用，看重理学，同时又讲究文辞之婉丽。此外，黄潛在此还进一步指出了当时论文以朝廷台阁与山林草野为分类原则的普遍情形，而且点出其“所处不同，则所施亦异”的区分原因。到了明初宋濂之时，非常明显地

①（元）戴良：《夷白斋稿序》，《九灵山房集》补编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37页。

②（元）黄潛：《云蓬集序》，《金华黄先生文集》卷18，《四部丛刊初编》，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集部，第239册，第177页。

承袭了元人的观点：“昔人之论文者，曰有山林之文，有台阁之文。山林之文，其气枯以槁；台阁之文，其气丽以雄。岂惟天之降才尔殊也？亦以所居之地不同，故其发于言辞之或异耳。濂尝以此而求诸家之诗，其见于山林者，无非风云月露之形，花木虫鱼之玩，山川原隰之胜而已。然其情也曲以畅，故其音也眇以幽。若夫处台阁则不然，览乎城观宫阙之壮，典章文物之懿，甲兵卒乘之雄，华夷会同之盛，所以恢廓其心胸，踔厉其志气者，无不厚也，无不硕也。故不发则已，发则其音淳庞而雍容，铿锵而铿锵。甚矣哉，所居之移人乎！”^①宋濂在两方面继承了元代的台阁体内涵，一是“淳庞而雍容”的雅正平和体貌，二是形成山林与台阁的差异是由于“所居之地不同”。但他也有两点突破，一是将原来用之于论文的体派划分推及于论诗，并且没有完全排斥山林之诗，而是肯定了“其情也曲以畅，故其音也眇以幽”的长处；二是以气之强弱来区分台阁与山林的不同。元人虽也经常以气论文，但他们所说的气主要指王朝疆域广大与国势强盛所造成的气势之盛，宋濂也讲朝廷的气派与威势，但又必须最终落实到创作主体志气的深厚硕大。宋濂的观点代表了明代刚刚建立使文人们所拥有的自信与豪迈，并且集中体现了一批文人从山林进入台阁的心态与文风。到了三杨时的台阁体，依然继承了体貌平和，崇尚实用，看重理学的传统，但已经不讲文辞婉丽，不讲主体盛气，也就是没有了“丽以雄”的盛大铿锵。显而易见，对台阁体文风的演变必须要将元明之际作为一个整体，才能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最后对于构成当时文学思潮的复杂原因能够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许多历史因素都不是产生于一时一事的现象，而是存在着

① 罗月霞主编：《汪右丞诗集序》，《宋濂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81页。

许多深层的复杂历史关联，只有将某一阶段的前后关联都弄清楚了，此一时期的许多现象才能呈现出其真实面貌。比如明初许多文人都有很强烈的隐逸倾向，以前学术界大都将其归于明初朱元璋严刑峻法的威慑以及对于旧王朝的留恋等，其实情况相当复杂，某些因素是元代历史的延续。可以说隐逸是元代文人很普遍的人生旨趣，而且越到元末这种隐逸倾向越强烈。而要追究元代文人的隐逸倾向，又必须考察有元一代文人群体存在的整体状况，比如科举考试的停止，文人地位的边缘化，文化政策的宽松，江南经济的发达，等等。只要这些历史因素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隐逸的倾向就不会消逝；即使这些因素已经改变，文人们长期养成的人生旨趣依然会因为顽强的历史惯性而难以遽然改观。更何况有的历史因素表面上似乎已经改变，却依然在深层保留着原有的性质。比如文人的地位问题，所谓元代文人地位低下，并不是说他们就没有仕进的机会与成功的可能，而是在两个方面与宋代相比而大相径庭：一是不再通过科举考试来铨选官员，而是通过荐举的方式以入仕途，并且大都要经过一个充当吏员的时期，然后才能辗转升迁；二是汉族文人尤其江南文人在政权结构中即使做了官，也不能做正职而只能屈居副职，并因此常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心有压抑与苦闷的感觉。进入明代之后，这种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观，科举制度得以恢复，文人被大批地征入朝廷为官，照理说文人们应该纷纷走出山林而踊跃入仕。但实际上并没有如此乐观，更多的人还是隐居不出，弄得朱元璋最后不得不制定一个“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的法令，即凡是不肯做官者一律可以抄其家而斩其首的规定。朱元璋尽管想方设法将文人驱入仕途，但使用文人却太随意轻率，常常将他们当吏员对待。文人的地位难以稳定，尊严难以保证，才能难以发挥，还常常遭受莫名其妙的

责罚，甚至有性命之忧。如此情况自然使他们依然会采取回避政治的态度，从而难以改变其隐逸的人生选择。认识到这种复杂的现象，就会对明初文学思想的复杂内涵与演变趋势具有较为深入的认识。从理性上讲，文人们对于战乱的结束，对于汉族政权的建立，对于国家的统一都满心欢喜，并为此写做诗文表达激动的感情。当时的宋濂等主流派文人都渴望文学就此能展现出博大昌明、雄浑高昂的格调。但是由于隐逸倾向的存在，由于文人回避政治的态度，由于文人惴惴不安的心理，因而这种文学的理想并没有变成文学现实，反而使文学创作迅速地衰落下去。

从上述情况看来，以前所谓的文学整体观需要得到纠正：整体观不仅要从明代一个朝代的文学整体着眼，更要从跨越朝代的元明之际这一整体观入手，才能使研究推向深入。而其他朝代的转折之际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此种情况，因此此一领域的研究理应得到加强并拥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原刊《光明日报》2007年4月3日）

玉山雅会与元明之际文人生命方式及诗学意义

元代的诗社相当发达，江南文人的聚会更是司空见惯，越到后期就越是普遍，从元代诗坛的主流形态看，结社分韵赋诗与同题咏诗成为最为主要的两种创作方式。玉山雅会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从至正八年至元代末年这里集中了当时最为知名的一批诗人，而且他们的人生模式与诗歌创作风格集中代表了元代后期文人结社赋诗的典型特征，是认识元人诗歌创作的有效窗口。简言之，以这种方式所进行的诗歌创作不能仅从文本的角度来理解，因为这种方式非但是文学活动，也是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并深深影响了当时的诗歌观念与创作风貌。

所谓玉山雅会，是与顾瑛的名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如此评介顾瑛：

少轻财结客，年三十始折节读书，与天下胜流相唱和。举茂才，署会稽教谕，辟行省属官，皆不就，年四十即以家产尽付其子元臣，卜筑玉山草堂，池馆声伎、图画器玩甲于江左，风流文采倾动一时。后元臣仕为水军副都万户，元亡随例徙临濠，瑛亦偕往。洪武二年卒。尝自题其画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说旧时豪侠兴，五陵衣

马洛阳街。”纪其实也。《明史》文苑传附载陶宗仪传末，杨循吉苏谈曰：“阿瑛好事而能文，其所作不逮诸客，而词语流丽，亦时动人，故在当时得以周旋骚坛之上，非独以财故也。今观所作，虽生当元季，正诗格绮靡之时，未能自拔于流俗，而清丽芊绵，出入于温岐李贺间，亦复自饶高韵，未可概以诗余斥之。”^①

从此段记述可以知道如下几点：一是他虽无意于功名，却并不反对儿子就职元朝廷；二是他当时以风流文采著名，具有倾动一时的轰动效应；三是他入明后由于儿子曾出任元朝廷而遭流放，并死于流放之地；四是他虽然以提供“池馆声伎、图画器玩”的东道主而著称，却并非全为附庸风雅的粗人，而具有相当的诗才。而他的玉山草堂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的文坛中心，则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充裕的家产作为物质基础，二是有一大批与之兴趣相近的文人群体。当时参加草堂聚会的文人约有50余人，几乎罗致了当时所有的东南文坛名流，其聚会内容则主要是饮酒听曲与唱和赋诗，其聚会目的在前期主要为行乐而后期为避难。这群文人身处社会动荡、战乱四起的时代，却依然能够纵情诗酒，实在是把旁观者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玉山雅会的核心成员当然是一些与顾瑛的人生志趣接近的文人，比如杨维禎、倪瓒、于立、郟韶、袁华以及释良琦等，都是仕途失意或者本来就对仕途缺乏兴趣的文人。在元末的江南，曾有三个文人聚会之地，这就是杨维禎的“草玄阁”，倪瓒的“清閟阁”，再就是玉山草堂，上述这些文人就是经常出入这些场所的群体。

^①（元）顾瑛著：《玉山璞稿》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

那么，玉山草堂何以有如此超凡脱俗的魅力呢？李祁在《草堂名胜集序》里曾经有过概括：

昆山之世族居界溪者，曰顾，顾氏之有才谔者，曰仲瑛。仲瑛即所居之偏僻地以为园池，园之中，为堂，为舍，为楼，为斋，为舫。敞之而为轩，结之而为巢，葺之而为亭。植以嘉木善草，被之芙蕖菱芡，郁焉而阴，焕焉而明，阒焉而深，一日之间不可以遍赏。而所谓‘玉山草堂’，又其胜处也。良辰美景，士友群集，四方之来，与朝士之能为文辞者，凡过苏必之焉，之则欢意浓浹。随兴所至，罗樽俎，陈砚席，列坐而赋，分题布韵，无问宾主。仙翁释子亦往往而在。歌行比兴，长短杂体，靡所不有。^①

从园林建筑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少见的大型园林，其中楼台亭阁有 28 处之多：玉山堂，玉山佳处，种玉亭，小蓬莱，碧梧翠竹堂，湖光山色楼，读书舍，可诗斋，醉雪斋，白云海，来龟轩，雪巢，春草池，绿波亭，绛雪亭，浣华馆，柳塘春，渔庄，书画舫，春晖楼，秋华亭，淡香亭，君子亭，钓月轩，拜石坛，寒翠所，芝云堂，金粟影。每一处均经过精心设计与修建，别的不讲，单是匾额的题署便相当讲究，全是虞集、杜本、赵孟頫、达兼善等名家的墨宝，更不要说其中多有珍奇的名花异草，各种的美味佳肴，美丽的歌儿舞女，再加上士友群集的整体效应，真可谓是一个难得的世外桃源了。杨维禎曾撰有《玉山雅集图志》，描绘了其中的一次盛况：

①（元）顾瑛辑，杨镰等整理：《玉山名胜集》，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6—7 页。